

典冊載籍

《四庫全書》的成書與時空環境



《欽定四庫全書》五色封面代表總目及經、史、子、集，裝裱精美，為首部完成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現，是否與修書當年的時空環境有所關聯，則尙少見觸及，故本文擬就修書當年的時空環境與成書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歷史長河流動下的收書架構

清人入關建國，論其人口數量，

《四庫全書》的成書與時空環境

前言

近年來，許多探求清代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學者，常利用清宮遺存有關雨水、糧價的檔案，進行剖析當年的學術問題真相。何以學者會從細微的環境末節入手呢？因為一個時代中，如果長期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糧價自然平穩。人民生活安逸情況下，動亂便不易滋生，於是政治容易清明，經濟隨之繁榮，文化當然也就跟著快速發展。反之，天災不

斷，人禍頻生，經濟蕭條，必無文化建樹可言。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早已言明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

《四庫全書》這部大叢書成書之後，至少具有：集中歷史文獻、傳存珍貴史料、系統的排列群書、提供研究者利用上的方便等多項學術貢獻。故自其成書之日起，即倍受學林的推重，而為之撰文研討者，指不勝屈。綜觀歷來有關研論四庫學之文篇，大

遠遠不及漢民族，而其民族所擁有的文化深度，也遠不如中原文明。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為達到統治的目的，除利用高壓手段之外，認同中原文化，以華制華，不失為統治良策。於是清室著手進行模糊民族界線的觀念，首先提出：

蓋生民之道，維有德者可以為天下君，……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別乎？……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註一）

圖用巧辯立說的方法來迷惑人心。為配合此一政策，便積極推動文化認同工作，一方面遵循舊有的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籠絡知識份子。一方面全力進行漢文獻的整理工作，康熙朝編纂的各類大型圖書已不下數十種之多，清高宗更在其統治權更形穩固下，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發動中國文化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規模徵書運動，以做為總結中原文化大工程的準備，十數年後，《四庫全書》於焉問世。

整體而言，清室所以修纂《全書》，無非是想打著稽古右文的名

都集中於文本學、歷史學、結構學與文化學等面向，也就是偏重於《四庫全書》：著錄書所依據的版本、謄錄文字的正誤問題；修纂動機、成書過程、皮藏情況、重檢暨篡改、續修工作、出版流傳；編目分類、部次群書、裝潢函架、提要撰作；選書標準、文化意義、學術評價、知識輪廓等等學術方面的探索，並且在各問題上都得到了相當的研究成績。至於這部大叢書所以會有上列學術問題的出

號，為進入明清時代高度成熟的漢文明進行總清算，以達成其長期統治的目的。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背景之下，自然要標舉儒家文化大旗，也就是為知識界完成「儒藏」的編纂大業。所以清高宗明示：「予蒐羅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說明了修《全書》的主要用意乃在廣繼儒家所謂的道統。在這樣的傳統文化理念下，於是「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儒家著作，成為《四庫全書》中的核心架構。因此不僅群書的排列，遵循舊有經、史為首的順序，既連文字抄錄的法則，也受到相當的影響。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十月初七日，清高宗就曾頒示館臣說：

朕御製詩文之內，如周程張朱皆稱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只稱其號而不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諸臣辦理《四庫全



典冊載籍

《四庫全書》的成書與時空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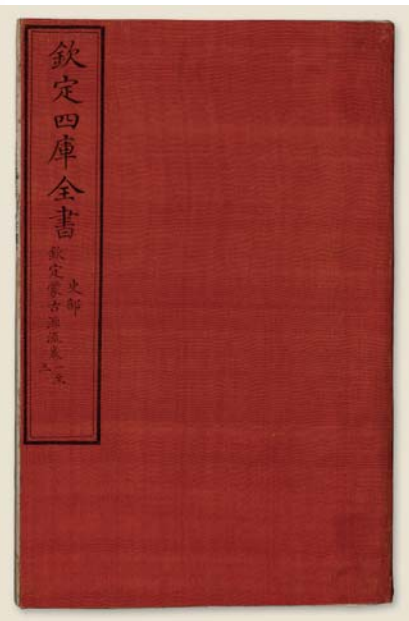


《異域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蒙人—托克托《宋史》、《金史》、《遼史》、納新《河朔訪古記》、寶巴《易源奧義》、《周易原旨》、小撤辰薩

滿人—納蘭性德《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圖理深



《欽定蒙古源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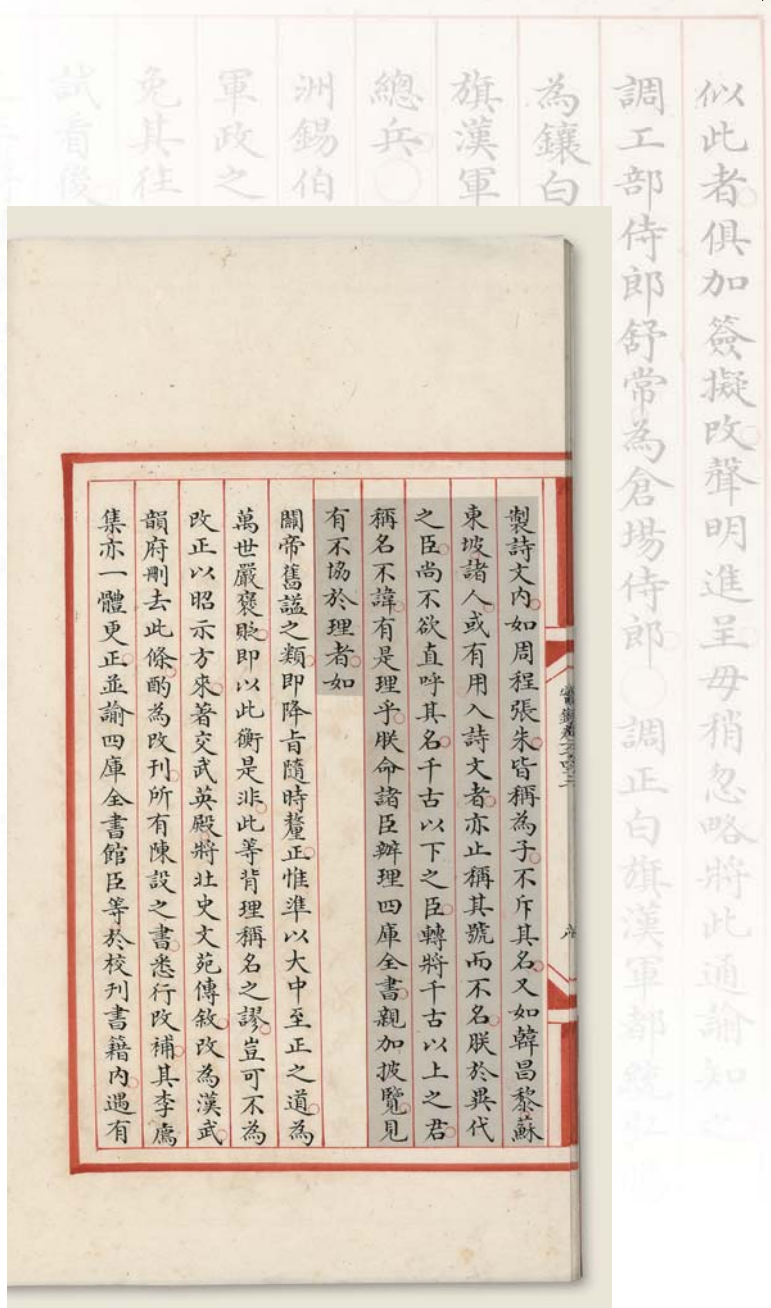


囊台吉《蒙古源流》。新疆人—瑪哈穆特《七政推步》、瞻思《河防通議》。除上述諸書之外，另又著錄若干以少數民族文字譯成漢文的圖書，如《三史國語解》由滿文譯出，《唐開元占經》係由西域《九執曆》譯出，最特

不過，漢文化之所以能成其大，還有一種特別的傳統，那便是在儒家主流文化之外，也尊重所有學術的存在與發展，故歷史上自來有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的說法，並且強調「識小之徒，專門撰述」於「增廣見聞」之外，往往又能「羽翼群經」。居於這種學術

傳統環境下，清高宗對訪書運動開宗明義即指示：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著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令所屬，加意購訪。(註二) 訪書既不排除儒家經籍以外的圖書，《四庫全書》著錄書也容納了許多非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說法。清人以少數族群入主中原，瞭解其人口數量及文化深度都處於相對弱勢，因而積極從文化認同上著手，企圖以淡化民族觀念的手段，來鞏固政權。然而居於民族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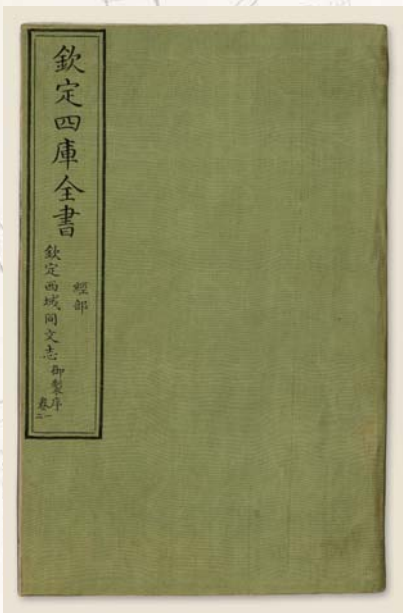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為子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閻帝舊諡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為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為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為漢武韻府刪去此條酌為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並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

儒學門類的重要書刊，並且在修纂凡例中明白開示：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四庫全書》的成書，在這樣的歷史環境影響下，遂從「儒藏」的原始意念，一變而成為一部「綜群書淵海」的大叢書。 現實環境下的新文化界線觀

典冊載籍

《四庫全書》的成書與時空環境



《欽定西域圖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域圖志》滿文、漢文、蒙文、藏文、回文、托忒文對照。其實，上列圖書內容與《四庫全書》修纂之宗旨毫無關聯，但居於政治現實考量，就有其著錄的必要性。

統治需求下的文字改造術

清人以外族入主中原，忌諱極多，對典籍中有不利其統治或誣蔑外族的文字，始終如芒刺在背，不拔除不快。在這樣的時代需求下，正好利用修纂大書的機會，一方面誘出「忌諱字面」的藏書，一方面則進行對古今所有著作的審查。清高宗於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八月五日曾頒諭：「若見有誣謾本朝之書，或係稗官私藏，或係詩文專集，應無不共知切齒，豈有尚聽其潛匿流傳，貽惑後世，……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燬。」（註四）足見四庫全書修書處兼負審查圖書任務。於是又擬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以做為執行依據，而其處理方式約可分為：

排拒嚴重違礙之圖書

《四庫全書》對敏感之政治性圖書都加以排斥，例如：錢謙益、屈大均、金堡、呂留良、王錫侯、徐述夔、卓長齡、戴孝移、戴昆、孔繼紛、尹嘉銓、李清等人被列為最嚴重的政治問題人物。對這些人的著作，一概加以禁絕，並對《四庫全書》其他著錄書中，只要涉及以上諸人的一切文字，都必須撤出銷燬。此外最特殊的是，清高宗不止一次提到：「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若楊澍、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註五）但此等諸人如黃道周的《石齋藏》、《解齊環》、《解遼環》……，熊廷弼的《按遼書稿》、《經略書稿》……，左光斗的《左忠毅公奏疏》等等著作，都不予收錄，蓋因這些著作或語涉遼邊，或內容多有民族大義凜然之辭，因而被摒斥於《全書》之外。

處理一般圖書中的違礙文字

四庫全書修書處於排拒重大違礙書籍外，對已決定收錄的圖書中，如遇有違礙文字時，則用巧妙的手法加以處理，其辦法約有下列數端：

一、改易文字：例如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中《李石座》有「從來四夷八蠻為左衽矣」句，將之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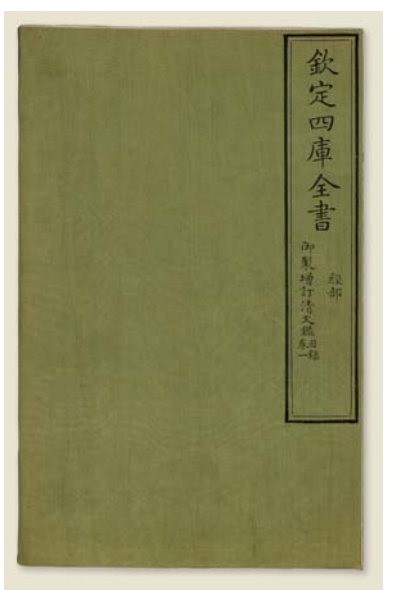
《河防通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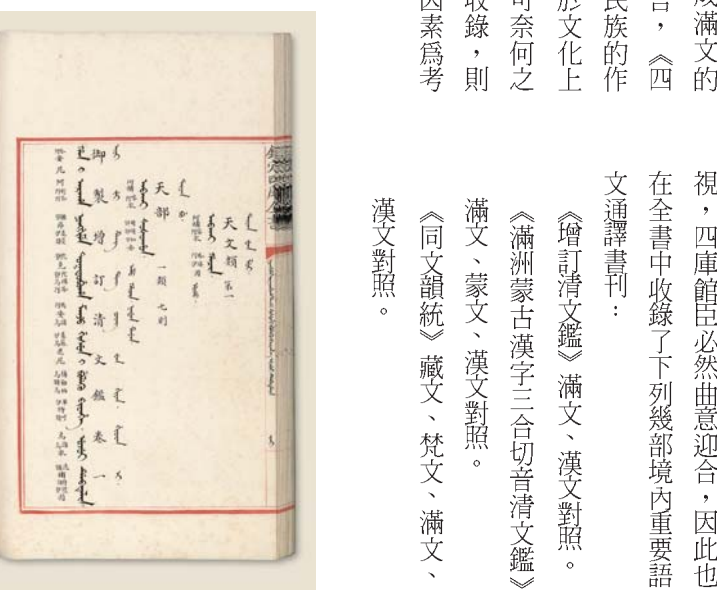
別的是，又著錄由漢文譯成滿文的《五經》及《四書》。總體而言，《四庫全書》著錄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作品所佔的比例甚少，這是居於文化上強弱勢對比的關係，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而所以猶予以點綴性的收錄，則完全以當時特有的政治環境因素為考量。

著錄境內一些語言文字的通譯書

中國土地廣大，族群複雜，除漢語之外，境內尚有多種語言文字，清室雖然認同中原文化，猶以滿文為國語。但使用滿文者畢竟極為少數，清高宗為便於統治，自己除精通漢、滿文字之外，也留意於其他重要文字的學習。他曾說：「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槳為之改正，是《西域志》之書，必應及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群疑，垂千秋之信錄。」皇上的重



《御製增訂清文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視，四庫館臣必然曲意迎合，因此也在全書中收錄了下列幾部境內重要語文通譯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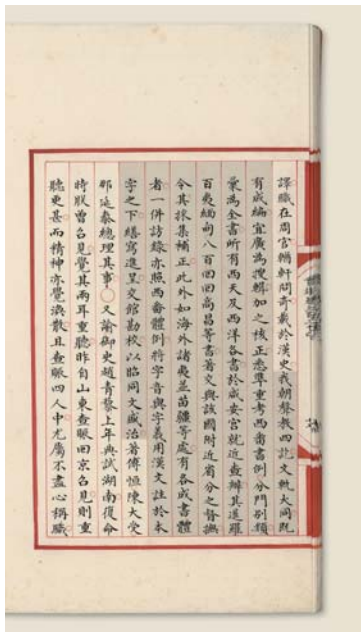
《增訂清文鑑》滿文、漢文對照。
《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滿文、蒙文、漢文對照。
《同文韻統》藏文、梵文、滿文、漢文對照。

典冊載籍

《四庫全書》的成書與時空環境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十三年九月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秋提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
調工部侍郎舒常為倉場侍郎○調正白旗漢軍都統
為鑲白
旗漢軍
總兵
洲錫伯
軍政之
免其往
試看後

與外在世界的存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均著錄佛經釋經籍，而《隋書經籍志》中也著錄外來醫書十餘種之多。至於古代知識界有關介紹外在世界的典籍，更不在少數，諸如劉宋時代的《佛國記》、唐朝的《大唐西域記》、宋代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朝的《真臘風土記》等等都是顯例。（註八）明代時期，西洋傳教士東來，許多有關數學、天文及其他科學方面的圖書，漸漸受到當時知識界的重視。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李之藻在其上「請譯西洋等書」疏中即提出「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者」，而創議「選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以昭九域同文之盛。」入清以後，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清聖祖同樣重視遠來的歐西學術，而於康熙十二年（一七二三）敕編《律呂正義續編》，在其《總說》文中說：

我朝定鼎以來，四海悉入版圖，遠人慕化而來者漸多，有西洋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昇者，精於音樂，：
：又有壹大里呀國人德里格者，亦精律學。
西學的某此特長，受到相當肯定。清高宗更於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九月十一日頒諭說：
朕閱四譯館所存外番番字，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訛缺，因思象胥鞮譯，職在周官，輶軒問奇，載在漢史。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核正，悉準重考西番書例，分別門類，彙為全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各有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校勘，以昭同文盛治。
清高宗重視西洋著作，並令廣為搜輯，集中於咸安宮進行查辦。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直接影響到四庫全書修書處，館臣特於全書編纂體例的第七條中規定：
外國之作，前史罕載，然既歸王化，即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

為「從古以來賢才屈抑多矣。」又如元陳則通《春秋提綱》卷一《鄭師敗績》章：「獨唯一鄭馬耳，鄭於春秋，其關於中國夷狄盛衰之變，豈淺淺哉！」句，將「中國夷狄」四字改易為「一時伯業」。
二、刪削字句：例如唐張肅《唐新語》卷十四「多著羣羅，雖發自夷狄而全身障蔽。」館臣將「雖發自夷狄而」六字刪削，又將稍後之「羣羅始絕」句下「開元初，宮人馬上始著胡帽，靚妝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一大段文字全部刪除。
三、抽燬部分篇章：例如明黃訓所編《皇明名臣經濟錄》被刪去的文篇計有：卷六丘濬《審機微》《正朝廷》、馬文什《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宋端儀《彭韶行狀錄》、楊守陳《請講學聽政事》。卷十九霍韜《題泰和襲封疏》、羅倫《扶植綱常疏》、王恕《論奪情非令典奏狀》。卷二十丘

濬《貢賦之常一》《貢賦之常二》。卷二十一王鏊《論制科》。卷二十七何喬新《題禁治異服異言事》。卷三十二王安《襲替功次疏》。卷三十八于謙《為關隘事》。卷四十五丘濬《總論刑刑之義》、尹直《論條例》。以上各文篇，皆因內容涉及邊夷及過分彰顯明代帝業帝德，而全部予以抽出銷燬。（註八）
四、偽纂篇章：四庫館臣有時在抽燬整篇文章之後，另外又偽造一篇文字替代之。例如宋莊綽《雞肋編》中原有《孔子宅》一文，係敘述金人南侵時，經過山東曲阜孔子老家，指著其處大罵：此為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的人，於是放火燒屋。因《孔子宅》文中記載金兵暴行甚多，館臣為泯其跡，乃刪去全篇，另杜撰一篇敘述孔子世系的文章來補其位。（註七）

歐風東漸下的新知識輪廓

雍正

勤政的皇帝·傳奇的一生 簡介

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是一位相當傑出的皇帝，也是一位頗受爭議的皇帝。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著名清史學家陳捷先教授所撰《雍正：勤政的皇帝·傳奇的一生》一書，根據可靠的史料來呈現雍正皇帝的性格及其為政得失，從而讓讀者瞭解雍正皇帝的真實面目，並重新認識雍正時代的歷史功過。



結論
學術所以生生不息，並受到重視的原因，大都肇因於它既能承接傳統，又能結合外來新知，不斷的創造

四、四庫館臣關心時代學術新知，打

其技能」為優先原則。
一日清高宗所頒示：「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才予以著錄。因而此一有關天主教教義的書，都因為「言非立訓，義或違經」，而被排斥在外，所以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西洋著作，大致不離「增廣異聞」及「取其技能」為優先原則。

二、館臣重視學林的需求，大規模的集結重要文獻，並以最有條理的分類方法，井井有序的部次文獻，為利用者大開方便之門，是項整理典籍的用心，值得肯定。
三、《四庫全書》的修纂，因受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以致造成許多文獻資料的失真失實，今後應加速進行其補正工作，才能使其文獻更具學術利用價值。

不過四庫館臣收錄西洋著作還是以不違背「崇儒重道」為傳統的文化觀念，而有其收錄的特定原則，亦即嚴守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二月十一日清高宗所頒示：「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才予以著錄。因而此一有關天主教教義的書，都因為「言非立訓，義或違經」，而被排斥在外，所以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西洋著作，大致不離「增廣異聞」及「取其技能」為優先原則。

一、四庫館臣為進入明清時代高度成熟的中國文化進行總結工作，既能尊重儒家道統，又能以納百川的精神，顧及所有門類學術，這種修書的態度，值得敬佩。
二、館臣重視學林的需求，大規模的集結重要文獻，並以最有條理的分類方法，井井有序的部次文獻，為利用者大開方便之門，是項整理典籍的用心，值得肯定。
三、《四庫全書》的修纂，因受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以致造成許多文獻資料的失真失實，今後應加速進行其補正工作，才能使其文獻更具學術利用價值。

木增、鄭麟趾、徐敬德，亦隨時代編入焉。錄黃旗漢軍副都統就在「不必分疆絕界」的理念下，《四庫全書》共收錄當時的外國人著作，計有：
經部四種（含存目一種）
史部十種（含存目二種）
子部二十三種（含存目十一種）
集部一種（存目）（註九）

與改進，才能適應時代潮流，滿足人類需要，故學術的發展，常受到歷史與時代環境的左右，《四庫全書》的成書，應不例外。因此，討論《全書》整體學術成效，自不能完全以今論古，毫不在意時空環境的變化，如果對這部大叢書強加否定、嚴加苛責，或過分的吹捧，都將有失偏頗。最後僅提出幾則觀念以做為本文之寫尾。

註釋：

1. 清世宗敕撰《大義覺迷錄》（清雍正間武英殿刊本）卷前，上諭。
2. 王重民《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北平圖書館，民國23年），上冊，頁50。
3. 全前註，上冊，頁1。
4.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前引書，上冊，頁31。
5. 全前註，上冊，頁64。
6. 按各刪削之文篇，係比對明嘉靖三十年（1551）原刊本《皇明名臣經濟錄》所得。
7. 見昌彼得〈談善本書〉，收在其所著《版本目錄學論叢》（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66年），頁13。
8. 參見拙撰〈中華民國台灣省區現藏古代域外漢文醫書之探討〉，收在《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出版，民國7年），頁107。
9. 參閱拙撰〈四庫全書收錄外國人作品之探求〉，收錄於《第四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民國80年），頁61。

破尊儒的狹隘觀念，收錄外來之西學圖書，雖然在質及量上都有可議，但其建構的新知識輪廓及以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收書原則，令人欽敬。
作者曾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